

国学新读本

明夷待访录

赵轶峰 注说



河南大学出版社

国学新读本

明夷待访录

赵轶峰 注说

河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夷待访录/赵轶峰注说.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6.6

(国学新读本)

ISBN 978-7-5649-2446-1

I . 明… II . 赵… III . ①哲学思想—中国—清前期
②《明夷待访录》—注释 IV . ①B249.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58535 号

责任编辑 陈广胜

责任校对 王袆鸣

封面设计 马 龙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 2401 号 邮编:450046

电话:0371—860597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制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50mm×960mm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194 千字

定 价 31.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国学新读本编辑委员会

总策划 马小泉

主 编 李振宏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小泉 王 健 朱绍侯 刘小敏

李中华 李振宏 苏凤捷 何晓明

张云鹏 张富祥 宋会群 杨天宇

杨寄林 杨朝明 赵国华 郑慧生

姜建设 袁喜生 曹 峰 曹础基

曾振宇 戚良德 龚留柱 熊铁基

序

最近一些年来,一股“国学热”的思潮强劲涌动,在文化学界以至于整个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为什么在这样一个社会的大变革时代,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最为传统的国学,却能引起国人的极大兴趣,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国学”作为一个学术文化概念,产生于近代。从渊源上讲,“国学”概念的产生,与“国粹”有些关联,并且是从对抗西学侵入的角度提出来的。今天,中华民族早已是一个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自立自强的民族,全球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世界文化的汇合与交融,也早已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在这样的历史大势中,却会有“国学热”的产生,乍一看来,确有不可思议之处。但实际上,国学的当代走红,则与我们今天所处的历史时代有着一定的关系。

随着改革开放的迅速推进,随着市场经济的强劲发展,传统道德受到了强烈冲击,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观念的碰撞也日益强烈。于是,如何看待传统文化的问题,就严峻地提到了国人的面前。传统文化的出路何在,它从何而来,要走向何方,如何对之进行价值重估,一切关心文化问题、有着强烈历史责任感的人们,无不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中国的传统学术。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对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冲击无法理解和接受,对现代经济发展对传

统道德的亵渎强烈抗议的人们，自然而然地发出向传统文化复归而倡导国学的呼声。总之，不论是出于积极的思考，还是抱着一种向后看的心态，对国学的重视则成了最近十多年来一种普遍的文化选择。

于是，对待“国学热”就需要有一个分析的态度。对于任何一个民族的发展来说，传统文化都是其牢固的根基，是其一切历史的出发点，摒弃传统、甚至全盘否定传统文化，都是幼稚可笑的，不可取的。但一遇到问题就求助于传统，甚至一味狂热地提倡向传统复归，也是走不通的，过去那句常说的“倒退是没有出路的”话，虽说不是什么至理名言，却也还是有些道理的。这些年来，一些地方出现的中小学生、甚至幼儿园小朋友的读经热，就是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国学，毕竟是一种学术，需要有一定的文化基础，有一定的分析批判能力，才能对之进行识读、鉴别而决定其取舍。所以，严格地说，对于国学，尤其是经学，在当代中国，需要的是研究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批判继承，而不是再像传统社会中那样采取唱诗班的方式，对青少年一代进行无分析的灌输。因此，如何弘扬传统文化，就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正是基于以上考虑，为着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也为着对社会上盲目崇尚读经的风气有所引导，我们组织了这套“国学新读本”丛书，选择一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影响较大的国学典籍，对之进行简明扼要的注释，然后在读本前边，用较大篇幅解读该典籍的基本思想文化内涵，评述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并对如何阅读该典籍做出读书方法上的引导。通过这样一个较为翔实的导读内容，以批判分析的态度，给青年人的国学典籍阅读提供一个健康的思想导向。根据这样的宗旨，这套丛书，在大的结构上，每本都分为“通说”和“简注”两个部分，“通说”是导读的性质，“简注”在于疏通文字，希望这样的安排，能够为青年朋友和一般社会读者

提供一个国学入门的向导。果能如此，也就实现了撰著者和出版者的愿望。

国学所以是国学，就在于它是我们祖国优秀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载体。在这些国学典籍中，包含着民族文化基因，蕴藏着民族精神的范型。衷心期待这套丛书能够成为广大读者学习国学精华、体认民族精神、继承祖国优秀文化遗产的良师益友。

李振宏

2008年2月28日

目 录

序	李振宏(1)
《明夷访谈录》通说	(1)
一 黄宗羲及其时代	(3)
二 黄宗羲的抗清作为和学术成就	(11)
三 关于《留书》	(20)
四 《明夷待访录》文本释读	(30)
五 《明夷待访录》的思想要旨	(86)
六 对后世《明夷待访录》评价的分析	(104)
七 如何阅读《明夷待访录》	(115)
八 校注说明	(119)
《明夷访谈录》简注	(121)
题辞	(121)
原君	(124)
原臣	(128)
原法	(131)

置相	(134)
学校	(139)
取士上	(148)
取士下	(152)
建都	(159)
方镇	(161)
田制一	(164)
田制二	(167)
田制三	(171)
兵制一	(176)
兵制二	(181)
兵制三	(185)
财计一	(188)
财计二	(193)
财计三	(197)
胥吏	(199)
奄宦上	(203)
奄宦下	(205)
附录	(207)
一 留书	(207)
二 顾宁人书	(215)
三 全祖望《书明夷待访录后》	(216)
四 黄承乙跋	(216)
五 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	(217)
六 《清史稿·黄宗羲传》	(227)

目 录 3

参考书目	(230)
后 记	(233)

《明夷待访录》通说

黄宗羲(1610—1695)所作的《明夷待访录》是中国思想史上一部传奇性的著作。它的篇幅不长，但影响深远。与黄宗羲同时代的另一位思想家顾炎武读过之后就觉得这是一部足以挽救百代颓势而振兴天下的著作，称“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百王之敝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①。须知在17世纪，人们能够设想的最理想的社会，就是顾炎武所说的“三代”了。古代社会究竟如何，他们实际知之不详，但是揣摩着留传下来的经典和后人的解说，他们把自己能够想象得到的良好社会状态都寄托到了夏商周时代。于是“三代”成了最高理想社会的代名词，成了一个论说的符号。

黄宗羲和顾炎武等人那种渺茫的希望，后来自然是落空了。代明而兴的清朝，无论在前期有多少文治武功，毕竟和明朝一样，都是一个旧式的王朝，不仅与黄宗羲、顾炎武心仪的理想社会相去甚远，而且在政治上比前代更加专制。《明夷待访录》即使删除了一些最遭时忌的篇章，仍然难以公开地在清朝统治的社会流传，只能在黄宗羲的弟子、家人中间传看，因此并不为清朝前期的世人广

① 顾炎武：《顾宁人书》，见本书附录。

泛了解。

两百多年以后，也就是 19 世纪的后半叶，清朝和所有王朝一样，走到了它的穷途末路。与以往改朝换代的局势不同的是，这个王朝末世与前所未有的西方列强对中国的进逼相伴而生，整个中国面临的问题，除了政权的更替，还有国家被分割、吞没的危险。

虽然普通民众永远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但是，每当社会遭遇巨大的危机，总要有一些比普通人更有勇气和见识的人站出来，在大多数民众之前，做出重大的抉择，把民众组织起来，向着新的方向努力。晚清时代的中国，能够有这种能力与心胸的人，除了知识分子，还有一些具有新观念和社会理想的官僚和实业家。实际上，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开始，这些人就随着变幻的时局而在不断地探索了。到 19 世纪末的时候，知识分子、官僚和实业家中的许多人，已经不同程度地接触了西方的思想和事物，群体构成发生了转变，浮现出一些有新思想的新型社会精英。他们认识到，中国必须改造几千年陈陈相因的传统和制度，否则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中难以生存下去。而改造旧制度必要的武器和目标，就是民主政治。其中的梁启超等人，了解了卢梭等启蒙思想家表述的西方社会思想，再以这种新思维审查中国的历史传统，于是发现被湮没两百多年的《明夷待访录》，其实是中国思想史上与西方民主思想最为接近的著作。他们欣喜若狂地把这本小书印刷发行，作为鼓吹革命的思想工具。于是，黄宗羲这部在清朝两百多年间难得流行的小书，竟成了晚清革命的一股现实的推助力。

延续数千年的帝制终于被推翻，中国进入了共和时代，《明夷待访录》批判君主专制制度的思想不再是改造现实的直接武器，而成了研究中国思想学术的历史文献。从梁启超以降，近百年来国内许多学人对这部著作做了研究，美国、日本的学者也发表了许多相关的著作。他们研究这部著作的着眼点，是想要回答这样的问

题：在中国思想文化传统中，是否曾经产生过民主思想？如果没有产生过，为什么？这些的确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明夷待访录》是中国历史上抨击君主专制体制最为激烈、最为系统的著作，如果连这部著作也不包含民主政治思想，那么中国文化传统就很有可能是与民主思想“绝缘”的——这会影响今天的人们看待中国历史文化的基本态度。如果《明夷待访录》包含了民主政治思想，那么达到了怎样的程度，其文化根源和理路究竟如何，这又涉及对中国文化传统，包括儒家思想的基本看法，乃至理解中国未来文化潜质的重要问题。但是，前面这些问题，主要是把提问集中在了“民主”这个概念上。其实，《明夷待访录》的内容并不是从“民主”与否的角度就能全部解读出来的。中国帝制时代可能产生的新社会构想指向什么社会状态，才是理解中国帝制时代思想和社会趋势的核心问题。中国近年“国学”复兴，人们从了解中国传统学术的角度，增强了研读《明夷待访录》这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著作的兴趣。从诸多角度看，《明夷待访录》都是应该认真读一读的。

要读懂《明夷待访录》，不能不先了解一下它的作者黄宗羲和他所处的时代。

一 黄宗羲及其时代

明朝万历三十八年(1610)八月八日，黄宗羲出生在浙江绍兴府余姚县通德乡黄竹浦(今余姚市明伟乡浦口村)的一个书香世家，为家中长子，后有弟宗炎、宗会、宗辕、宗彝。^①他的祖上于南

^① 关于黄宗羲出生地，学界有不同意见，这里采纳吴光先生的看法。详见吴光：《天下为主——黄宗羲传》，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宋绍兴年间从慈溪迁到余姚。黄宗羲的祖父黄日中，号鲲溟，是一位经学家，没有什么功名，但因黄宗羲的父亲黄尊素的官阶与声望而被追赠“太仆寺卿”。黄尊素(1584—1626)在黄宗羲出生时27岁，两年后登万历壬子科进士，次年得授宁国府(在今安徽省)推官，后来成为东林党的中坚人士，在天启年间魏忠贤专政时期被害，崇祯时期得到平反。黄宗羲的母亲姚氏，出身大家闺秀，能作诗，外柔内刚，对黄宗羲颇有影响。黄宗羲的名字中，“宗”字是按家族排辈用字，“羲”字取于上古传说中驾驭太阳车的神人羲和。他的字“太冲”，语出《淮南子·诠言训》：“聪明虽用，必反诸神，谓之太冲”，指聪明而至以神御之的境界。

黄宗羲出生时，明朝已经是一片末世景象。万历皇帝朱翊钧登极之初年龄尚幼，仰赖内阁首辅张居正的干练有为，收拾整顿嘉靖中后期就已经危机四伏的统治局面，实现了10年的安稳。张居正素称沉毅果决，有许多业绩，但当手中的权力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步时，就不免自我膨胀，使得年纪渐长的万历皇帝觉得受到了臣子的压抑，也让许多朝臣觉得他专权跋扈。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去世，已经长大的万历皇帝不久就借故把张居正生前的官爵待遇一切削夺，而且弄些若有若无的罪名，抄了他的家。但是亲理政务仅仅4年，这个年轻的皇帝就被政务和朝臣无休止的规劝和相互攻击搞得郁闷不堪，于是以身体不佳为由，开始回避朝政，既很少上朝接见大臣，也不去行祭奠天地、祖先的大礼，时称“九重渊默”、“郊庙不亲”。后来陆续接替张居正做内阁首辅的几个大臣，汲取了张居正专权致祸的教训，把内阁弄成了一个和稀泥的地方，只是在调和各种主张中苟且时日，而不去做任何有远见和需要担当的事情。国家政务千头万绪，皇帝和首辅都不去认真料理，大局常常莫衷一是，于是内阁、九卿、言官，便纷纷攘攘地争吵，党同伐异地倾轧，形成了一个乱局。万历二十年(1592)前后，又连

续发生几件大事，终于把明朝引向了崩溃。

万历二十年四月，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发兵 18 万有余，兵船数百艘，入侵明朝的藩属国朝鲜，在 3 个月间就几乎占领了朝鲜全境。朝鲜国王李昰向明朝告急。明朝在未弄清详情的情况下，派了 3000 人的军队增援朝鲜，结果全军覆没，举朝震动，后又派了 4 万大军赶赴朝鲜，才把日军击退。可是万历二十五年（1597），日军又集结了 14 万兵力再度侵入朝鲜。明朝的援兵与朝鲜军队共同抗击日寇，互有胜负。次年七月，侵略成性的丰臣秀吉病死，明朝与朝鲜的军队才联合击败了日军。

同是万历二十年，宁夏副总兵哱拜因为有功劳而没有得到朝廷合理封赏，加上上级扣发了他的军队应得的饷银，便发动了叛乱。明朝调遣大军，历时半年，才把叛乱平息下去。

还是在这一年，四川、贵州交界处播州的土司杨应龙被指控凶暴滥杀，依法当斩。但是此人拒绝接受审查、处罚，并把明朝派去处置他的军队打败。明朝调集邻省军队进剿，到万历二十八年（1600）才将他击败。

这三件战事，史称“三大征”。为了进行这三场征战，明朝一共开支了 1170 万两白银。^① 当时明朝户部掌管的中央国库，每年的标准收入额也就 400 万两左右。也就是说，明朝政府上下不吃不喝，把中央财政三年的收入都用了，才能支付这三大征的开支。所以，这三大征基本耗尽了明朝的白银储备。

祸不单行，万历二十四年（1596），紫禁城内坤宁宫、乾清宫两宫俱焚。万历二十五年（1597），皇极殿、中极殿、建极殿三殿俱焚。

^① 王德完：《稽财用匮竭之源酌营造缓急之务以光圣德以济时艰疏》，载于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卷 444，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 4884—4887 页。

要重新修建这些宫殿，需要耗费无法计量的白银和物资。可是国库已经贫乏，无法应付这样巨大的开支以及皇室家族极其奢靡的日常费用，朝臣便经常与万历皇帝围绕白银开支争吵。万历皇帝另辟蹊径，在万历二十四年向全国派出了大批宦官，称作“矿监”“税使”，以监督金银矿开采和赋税征收的名义，直接在全国搜刮财富。结果闹得举国上下，民怨沸腾。尽管朝野一片抗议之声，万历皇帝还是坚持这种搜刮社会的政策，直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他“龙驭上宾”，方才终止。在这二十多年间，社会矛盾空前激化，民变蜂起。而且，辽东地方逐步强大起来的后金政权，也在努尔哈赤的率领下公开起兵，开始对明朝展开进攻了。

明朝的下层社会，自中叶以来，就被皇室为首的大贵族和官僚权贵阶层的土地兼并所困扰。万历皇帝把爱子朱常洵封为福王的时候，更以赐予庄田的名义，把河南、山东、湖广地方 200 万亩田地的赋税收入置于其名下。天启皇帝封赐桂王、惠王、瑞王、遂平公主、宁国公主的庄田，少者数十万亩，多者 300 万亩。这么多土地的收益被分割给少数贵族，皇室堆积了大量的财富，国库却更为贫乏，加上当时猛增的战争开支，明朝陷入难以化解的财政危机。^①面临这种局面，明朝开始向全国人民加税。

明朝以应对努尔哈赤进兵的名义，向全国人民加派“辽饷”，每亩加征白银 9 厘，年额 520 万余两。天启皇帝统治的 7 年间，辽东的战事没有平息，山东又发生了徐鸿儒率领的白莲教武装叛乱。好歹平息了白莲教，连年灾荒的陕西又爆发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反叛运动。明朝为此又开始加征“剿饷”，每亩 6 分，随后又用练兵的名义再加征“练饷”。辽饷、剿饷、练饷，这“三饷”的总

^① 关于晚明财政危机的具体情况，可参看赵轶峰：《论明末财政危机》，东北师范大学 1984 年硕士学位论文。

额达到了7348.8万两。此外还陆续加征了“助饷”“均输”“新饷”等名目的税收。如此依然不敷用度，崇祯皇帝时就采用大量发行货币的法子来解决财政危机。但是铸造出来的铜钱烂恶不堪，无人肯于行用，又印发纸币，也没有成功。仅从国家财政角度看，崇祯时期，明朝就已经奄奄一息了。

万历中叶的一些士大夫试图为明朝提供改善补救的建议。其中最知名的，是原任吏部文选司郎中顾宪成罢官回家后组织起来的东林人士。顾宪成在万历二十二年（1594）被罢官回到无锡老家，万历三十二年（1604），他和一些志同道合的人重修了宋朝时建立的东林书院，并聚集起一些士人在那里一边讲学，一边评议时政。

顾宪成主张治学必须以用世为目的，他说了一段很有名的话：“官辇毂，念头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头不在百姓上，至于水间林下，三三两两，相与讲求性命，切磨德义，念头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齿也。”^①追随他的人也多认为，时局败坏的根源在于人心，人心败坏的根源在于学术不正，所以他们对当时影响较大的学术流派，包括明中叶以来流行的王阳明学派，都做了一些批评。在追溯学术、人心这些根源层面问题的同时，他们还“裁量人物，訾议国政”^②，希望形成一股“清议”的力量，促使朝中左右局面的人引以为参考。他们虽然看准了明朝统治危机的一些根源，但是在当时的局面下，要想挽救明朝的统治危机已经为时太晚。而且，所有的批评都会引起一些反弹，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朝野政治分歧更为加深。所以，这班东林人士苦心孤诣，在晚明一片混沌中展露出

^① 黄宗羲著，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卷58，《东林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77页。

^② 黄宗羲著，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卷58，《东林学案》，第1377页。